

澳 大 利 亚 文 学 作 品 选

本书由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资助出版
本书根据企鹅出版公司版本译出

心理医生和他的女病人

[澳] 罗德·琼斯 著 欧阳昱 译

主编 胡文仲 副主编 李书敏



中国·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医生和他的女病人/(澳大利亚)琼斯著;欧阳昱
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ISBN 7-5366-4693-3

I. 心… II. ①琼… ②欧…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
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0256 号

本书根据澳大利亚 Penguin Book Australia Ltd 1989 年出版的

JULIA PARADISE

译 出

▲心理医生和他的女病人

(原名《朱莉娅·帕瑞戴斯》)

[澳大利亚]罗德·琼斯 著
欧阳昱 译

特约编辑 蒲 黎

责任编辑 陈小丽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刘忠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

字数 62 千 插页 5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66-4693-3/I·911

定价 9.00 元

“在不少病例中，特别是有关女病人和需要阐明情欲思绪的病例中，病人的合作成了一种个人牺牲，这种牺牲只有以某种爱情的替代物才能得到补偿……”

弗洛伊德：《歇斯底里的精神疗法》

“是的，蠢就蠢在想得出结论。我们是线，可我们却想知道整张布匹……”

福楼拜：《书信集》



1

几年来，一位名叫肯尼思·艾雅司——人称“蜜瓜”的苏格兰医生一直靠着租界区那些流亡国外的英国人，特别是在阿斯特王朝饭店逗留的游客赚钱度日。一个新来者很快就发现，原来艾雅司吸烟上瘾，他的烟斗中习惯装满了“蜜瓜”。“加拉赫的蜜瓜”。以后，他还可能会听见人们窃窃私语，说这种叫法还有一种更为邪恶的来源。

1927年春，艾雅司34岁。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倒还不光是因为他的外表。他身材魁梧，体重约250磅，很不舒适地裹在浆过的领子和蓝哔叽西装里。当他把一身大块头推出



俱乐部,又推往饭店时(他坐落在阿斯特王朝饭店三楼的公寓就设有诊室),艾雅司不得不经常气喘吁吁地时走时停,稍事休息。在上海下午的滚滚车流中,人力车夫得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把艾雅司笨重的躯体拉动。

你也许在上海俱乐部见过他,人家送了他一个临时会员资格,但他从来没有完全成为正式会员,会员期也从来没有完全到期作废过。在长酒吧一半的地方,即商行经理和主要职员之间那片定义不很明确的“专业”行列中,他占据了分配给他的位置。你也许曾发现他在楼上,坐在俱乐部一把很深的皮安乐椅里,一手端着白兰地,一手拿着烟斗,正与某个也许刚刚到达东方的年轻人在进行正餐之后的交谈。艾雅司除了身高个大之外,还有一点也使人印象深刻,那就是他很健谈。

他爱谈三样东西:一是爱丁堡市,他在那儿度过童年,上过大学。二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在他的指导下在维也纳学习了一年,而且由于艾雅司蓄了胡子,而跟弗洛伊德有几分相像。三是艾雅司爱谈他的同胞 J·M·巴利,此人的剧本《彼得·潘》在 1904 年戏剧季节首演之时,艾雅司还是个 11 岁的小男孩,他趁学校放假期间跟父亲在伦敦看过这出戏,而且一下子就爱上了戏里面演温蒂的那个女演员。(完全是顺便说一句,巴利 1930 年成为爱丁堡大学的校长。)

除了他自己的标准以外,用其他任何标准衡量,艾雅司都算是功成名就。他父亲是苏格兰的一个陆军上校,学校毕业后,他令父亲失望,拒绝参军,转而学医。他是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期间才第一次对治疗神经紊乱发生兴趣的。

他在赫里福得郡的一家军事医院度过了战争时期,治疗



患炮弹休克症的病人。他在医院的护士站认识了一位当地姑娘并跟她结了婚。战后，她那纯属赫里福得郡贵族阶层的家庭开始在该地为他寻找一家安稳的开业地点，可他身上喀里多利亞人特有的不安于现状的想法抬头了，于是，艾雅司和他年轻的妻子在欧洲大陆旅行了一段时间。开始时他还想回到医院继续治疗神经病人，不料却发现自己报名参加了弗罗伊德的研究生班，好像纯出偶然，毫不费力地在维也纳度过了一年。

艾雅司并非天才，但他是个有才气、很认真的学生。在弗罗伊德圈子里那些光彩夺目、学问领先的人面前，他相形失色，但即使庸才也有庸才的本命年——维也纳的这一年就是艾雅司的本命年。但是，在1919年的冬天，他受到西班牙流行感冒的影响。他妻子在维也纳得了病，他们回到英国时，她就死了。

整整三年，艾雅司为了忘掉悲伤，工作到精疲力竭的地步，但仍无法忘却，于是决定采取英国人常用的另一种缓和剂——买船票去了东方。他本来想乘船去澳大利亚悉尼市，但却心血来潮，在上海下了船，而且一直都呆在那儿。

艾雅司在上海一直有点像个局外人。他在跑马俱乐部和长酒吧消磨时光，但他所有的熟人中间却没有一个人算得上是朋友。社交上面，那儿的英国人虽对他彬彬有礼，态度恭顺，但其中夹杂着疑心。似乎他们对他们的秘密了解得够多了，因为他的预约本上记满了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的名字，以及她们小病小痛的病例，歇斯底里，紧随恋爱破裂而来的精神崩溃等等，因此他们都倾向于排斥他。



他跟那些学中文,然后成为学者的英国人不一样。艾雅司最喜欢上海的一点就是那种过客般的感觉。当他坐在长酒吧或阿斯特王朝饭店的大厅时,艾雅司看着所有那些其他的外国人从他面前经过——那些英国女人,她们之中就连健康者也面色苍白,病恹恹的;那些冒险者,初出茅庐的画家和向人乞讨五美元钞票的作家;那些年轻而面生的美国传教士,他们好像希望靠着他们人多势众,就能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这里面有些人无聊得让人生厌。他们疲倦之极,却又盲目狂热,除了基督教和中国,其他一概不谈,句句话都不离这两个词。另一些人则怕得要死,这些新来者对大城市的唯一经历就是开航前在旧金山度过的那三天,此时,耳闻目睹眼前的八百万异教徒,他们突然觉得信仰脆弱得不堪一击了。他们手心冒汗,目光茫然,害怕脸上流露出恐惧。有时候,他们过了好几个月才重又出现,这时男人精神上已经垮了,女人则一个劲地说着疯话,堕落成了这个城市瓦砾堆中的一个部分,而且经常因吸毒上瘾而成为各种药物的牺牲品。

一个星期六下午的晚些时候,就有一位女性飞奔进阿斯特王朝饭店的这个前厅,她迟疑片刻,便转身消失在那扇仍在旋转的柏林门的玻璃隔板后面,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艾雅司刚好一眼瞥见了她的脸。她一眼看见了他,眼睛闪闪发光,眼神却好像迷失了方向。他发现前台服务员也注意到她了,可能还怀疑她是个妓女。这件事发生的时间不过一秒钟,绝不会超过一秒。就在艾雅司注意到她时,她已经在往外走了。

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这一次,她紧紧抓住一位牧师绅士的胳膊。那人戴着一顶帽子,领子是赛璐珞的,身穿黑色西



装,手提自己的纸板箱,尽管一个搬运工空着双手,跟着他走进大门。那女人仍然慌慌张张,分不清东西南北。前台服务员,那个中国人,跟她说话时,她竟尖叫起来,用手摸她身后一张舒适的客厅沙发,一坐下来就睡着了,把前台服务员弄得莫名其妙。那位传教士先生脚跟在地上蹭着,怯生生地来到前台解释,仍紧紧抱着那只纸板箱不放。

艾雅司看着这一切,像平时一样虽感兴趣,但表面上装得无动于衷,却吃惊地看见前台服务员朝他这边指着,又见那位牧师迈着同样迟疑不决的步子,摘下帽子,拖着脚跟走上前来。

艾雅司估摸这人年约 50,他长得皮肤白皙,头发秃顶,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从他谈话中,艾雅司明白,原来他名叫威利·帕瑞戴斯,在上海卫理公会教堂工作,根据他说话的土腔土调判断,他是澳大利亚人。

“我妻子,”他缓缓地说,“最近受了一点儿刺激。”

艾雅司似乎对他没有多大好感。他把抽完的雪茄烟蒂扔进铜痰盂里,掏出他的印花大手帕,从嘴角揩去一星唾沫,仔细检查了一下,重新把手帕放回兜里,就用手摸起他的烟斗来。

“恐怕她对事情过于激动了一点。”那人顿了顿,对艾雅司眨了眨眼。“倒不如说事情把她压倒了。她恐怕把她那捆东西完全弄丢了吧。”

艾雅司目光越过饭店前厅,看着那个在平静中熟睡的女人。她是个小个子,相貌平凡,难以归类,年龄无法确定,身穿一套黑色毛料西服。帕瑞戴斯牧师说:“你同意检查她的身体



吗？”艾雅司找到了他的烟斗，带着明显的厌恶查看着烟斗中污黑的烟油。

“你最好带她上楼来。看能不能先把她叫醒。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请几个伙计把她装进手推车里，坐行李电梯上楼。”

那位男子道歉说：“我妻子的病例把你之前的几个医生都给难住了。”他想了想后又补充道，“反正我也并不指望你能创造奇迹。”

艾雅司的房间在这座建筑物的三楼，由一座恶名昭著、很不可靠的电梯与地面相接，这座铁笼子就是工作时，也要在缆绳和滑轮上呻吟打颤。它是艾雅司生存中的灾星；他本人身体沉重，讨厌楼梯。今天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已经过了艾雅司通常喝茶的时间，电梯正在工作，可开电梯的人却哪儿都不见。他走过那座安了一扇滑动窗户的小木凹室，只见里面那男孩裹了一张毯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爬上通往电梯平台的三步梯级，拉开六角手风琴似的铁门，领着传教士和他的箱子进了电梯。门关上了，他转动了一下门把手。缆绳颤抖着，发出哀诉声，电梯开始上升。这时，艾雅司一眼瞥见两个搬运工正把昏迷不醒的小女人往一架小手推车上抬。

帕瑞戴斯牧师起先似乎不好意思对一个陌生人讲他妻子病情中涉及隐私的细节。但故事一旦开了头，走上正轨，艾雅司便觉得他是个心地善良、很有头脑的人，一心想着怎样让妻子重新恢复健康。他边讲边不时点头，好像为了使自己放心，他说的都是真话。艾雅司因此而能将所有细节串接成下面这个故事。

这位年轻女士在中国生活的第一年中，得了个毛病，大



白天常常渴望睡觉。从前她开展教学工作曾经精力极为充沛。每当睡意向她袭来之时，她就会零零星星地说些德语。童年时她在家听父亲讲过德语，尽管实际上她的母语是英文。她丈夫不会说德语。她渴望休息的同时，白天偶尔还伴随着一种睡意朦胧的状态——帕瑞戴斯牧师称之为“醒着做白日梦”。甚至在陪访问传教团的客人吃饭和谈话的时候，这位传教士的妻子也会站着睡着。

她妻子有一次跟随一队英国传教士和医生长途旅行穿过中国内地，开展福音传教活动时，视力忽然开始出现某种异常。该队有一个英国医生给她开了一副镇静剂。但治疗一结束，视力就又异常了，于是他给这个病起了另一个名字，叫幻觉症。

简单说来，她能在没有动物的地方看出动物来。这种动物幻想症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果它们是蓄意发明出来的，那倒是对想像力的一种赞美。她看见了小耗子，大老鼠，害虫和毒蛇——她似乎专拣那些精典的讨厌动物来想像。她老是挥之不去的一个幻象就是一条图案色彩斑斓的蛇，从她视线边上的地板上爬过去。她的动物幻想症伴随着对真动物的恐惧。她只要碰到皮毛之类的东西，哪怕是外套上的皮毛，也会感到恶心。她有一头宠物小狗，从前巴结讨好她，现在却让她厌恶，她有一次吓得发作起来，操起手杖把它打死了。

根据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基督教传教团的看法，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这个病人得了一种恶性的厌恶症，她把当地人，甚至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信基督教的中国人都唤做狗。她还开始受着严重的火焰幻象的折磨。她觉得好像她就要或者已经陷



入一座失火的大楼内而出不了。这种种幻象吞噬着她，把她一次次地抛入恐惧的发作之中，到了她都能闻到烟火味儿，听见火焰的哔剥声和其他受害者的喊叫声，手和脸上感到火烧得发烫的地步。

她跟丈夫一起回到了上海市外 20 英里处那所小小的教会学校，如今就在那儿生活和工作。她甚至对他们的欧洲同事也骂骂咧咧的，让她丈夫难为情，成了他一个甩不脱的包袱。她故意粗鲁地对待到传教团访问的人，跟她丈夫大发脾气。发起脾气来就用头去撞墙，把衣服上的扣子都扯掉，暴露自己的身体。

她的痴呆症糟糕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她开始越来越多地呆在自己房里不出来了。她生活在一种昏暗的世界中，几乎脱离了教会学校的日常生活。她过的是伤残人那种受人保护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要依靠药物。她在两种状态中摆动，一会儿麻木不仁，一会儿又闪过灿烂的幻象，在这种状态中，她有时会在她的便士笔记本（一种小学生用来抄作业的那种纸封皮的本子）上写作到夜深。

在这种“创造性的”时刻，她有时会离开房间，在教会学校的校园和校园外的乡间情绪激动地游来荡去。而在别的时候，她会搭火车去上海，挎着相机到中国人住的环境恶劣的地方日夜浪游——她有一个错觉，以为她是个“严肃”的摄影师。她的行为在这种时候往往会变得更加狂暴，更加反社会，因此她成了租界巡捕房的常客。头天晚上，她就这样越轨了一次，帕瑞戴斯牧师一早走街串巷到处找她，终于在一家工人茶馆里找到了她，就是现在这种可怜巴巴、精疲力竭的样子。他把



她从那儿带到了这里。

威利·帕瑞戴斯牧师以他自己那种可怜巴巴、精疲力竭的样子讲完了故事。他用手帕擦了擦他那涨红的粉红色额头。艾雅司仰靠在他的扶手椅里看了看他，混合着一种温和的探究和鄙夷的神情。“我能够指出来吗，”他平静地说，“这儿这类病例已经平常到平淡无奇的地步了。”

牧师不相信地呜咽了一声。“像我妻子这样的病例吗，你是说？”

“我见过医院病房住满得了神经病的英国女人，其中许多人都因其丈夫在殖民地服务机构所抱的野心而成为牺牲品。还有一些人就像浸透了杜松子酒的女佣人，到医院住只是为了戒酒，得到一点休息罢了。”

那个男人用平静而乞求的声音说：“可我们是卫理公会教徒呀。”

艾雅司回看了他一眼，从他胡子里露出的口型看得出一丝逗乐的神情。他说：“我们认为症结在东方。这些女人迟早是要坐船回家的，我敢说，在许多情况下，用单纯的思乡来解释也就够了。”

“这么说你把我妻子归于这一个类别了？”

“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想指出，我在咱们这儿的欧洲女性中间见到过很严重的痴呆病例。最后，治疗办法简单到买一张船票回家就成。”

“我们的家在这儿，艾雅司。这些人现在都是我们的人了。我们有教要传呀。”

艾雅司看了看他，并毫不掩饰他的鄙夷。那个男人看出

了这一点，很快地说道：“不过，你同意给她检查吗？”

“我给她检查吧。”艾雅司极力想露出微笑，但其效果反倒使来客更加不安了。“正如你所说，不会产生奇迹的。你先下楼喝点茶，我看能为她做些什么。你尝一块果馅饼蛋糕看看。这儿的茶的确不错。”

朱莉娅·帕瑞戴斯醒了。她躺在皮靠垫上，环顾着她置身于其中的这间奇怪的房间。她的脸上出现了一连串的表情：怒目瞪视，皱眉蹙眼，短暂地放松身体，堕入先前无精打采的状态，跟着又神情沮丧，样子绝对可怜巴巴。她开口说话时——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艾雅司的问题——声音因唾沫分泌过量而含混不清，唾沫不时从她嘴角控制不住地冒出来。

她长得并不漂亮。她的黑头发短而不干净，她的脸瘦得使眼睛看上去大得很不自然。她肤色苍白，显得贫血而不健康。她神经质的小小身材十分消瘦，仿佛从少女时代起就没有丰满过，而且，看起来她没长乳房。

从她躁动不安、痉挛性的动作，从她习惯性地堕入一种仿佛戴了面具的麻木不仁的表情，艾雅司一眼就看出，她真的患了一种严重的神经病。她脸上那张面具不时连招呼都不打，就扭歪起来，好像得了三叉神经病一样发着痉挛。她的手特别细，指关节上皮绷得很紧，指头都发红了，好像患了皮炎似地出现一块块鳞斑。她的脸衬着一对黑眼睛，两边凸露的颧骨和一头短发，显得十分消瘦，艾雅司不禁自问自道，她是不是得了什么器官方面的毛病，是不是本来就受着某种消蚀性疾病的折磨。他从她丈夫的描述中得出结论，认为她是个癔

病患者。一个原来给她做过检查的医生看样子也同意这个假定。

艾雅司意识到这一点时苦笑了一下。他走到他的桌旁，慢慢地，有条不紊地打开了他的手术包。他这个专家医生还没专家到不必去对付饭店客人得的那一类普通病痛，什么翻胃和拉肚子呀，什么喉咙疼和伤风感冒呀等等，这都是身体不行的男人的家常便饭——也是这类男人偶尔对充满异国情调的精神花园的一种劫掠。他翻找着袋子里的内容——听诊器、血压计、镀铬的大注射器和一盒针头，又找了找另一只箱子，里面装着几安瓿吗啡针剂。

此时，这个小女人险乎乎地坐在皮靠垫的边上，眼睛闪闪发亮地注视着他，不时用手背擦她的下巴。他走到她跟前，帮她脱去她那件缢缕的黑毛料西式上装，然后挽起她的衬衣袖子。

他没猜错。她右膀子上面布满了针眼。他注视着她，但她往下面膀子上看了一眼，脸上毫无表情。当他往他桌边走去拿注射器和一安瓿吗啡针剂时，他听见她喉咙里发出一种深沉的好似抱怨的嚎叫声——跟一头生病的动物的呜咽声一模一样。啜泣声，吸鼻子声，把唾沫往里吸的声音。他拿起酒精瓶子和一点废棉头。她把膀子伸出来等着。

“今天就算了，”他说，“让你那只膀子休息一下吧，我想。”他把她的裙边撩起来，越过膝头，一直撩到长统袜围住的大腿根处。他用酒精在肉上抹了一抹，然后拿起注射器，把针尖扎进安瓿针剂瓶上绷紧的橡皮里，把推子拉了起来。他把针头插入她干净而白皙的股肉中时，她身子缩了一下。



那天下午，艾雅司好像终于能一个人呆一会儿了。他的房间有一种黑暗、静谧而空荡荡的感觉。他此时无事可做，有点儿烦躁不安：星期六他一般要像英国人那样给自己放半天假。艾雅司回到他的书房，这是公寓前头一间大房，俯瞰着下面的街道。房间一角是一扇华丽的琥珀色和玫瑰色的玻璃窗——他一向认为在饭店客房安这种窗户是件很怪的事。小小的壁炉周围镶嵌着瓷砖，颜色跟琥珀色的玻璃很相配。星期六下午有一种寂寞的气味弥漫了他的各个房间。屋里有股家具擦光剂的陈旧气味和一股淡淡的橙香，使他不知怎么想起了威利·帕瑞戴斯牧师。

艾雅司关上百叶窗，又拉上窗帘，然后打开两盏落地灯，由于上海市供电量不可靠，灯泡光线不稳定地时强时弱。跟着，他让他笨重的躯体落坐在冬天的炉边椅里，那是一张尺寸过大的安乐椅，木椅背上有雕花图案，套着勃艮第红葡萄酒色的天鹅绒和有条纹的表面缝成图案的锦缎。他又拧亮了他的绿罩台灯，尽管他并不想去桌边坐下，看那成捆的邮件和一堆堆的英文报纸和期刊。

这时，他书房的门打开了，他的中国侍从端着托盘和咖啡出现了。侍从出去后，艾雅司伸手去拿咖啡壶倒咖啡，然后只穿衬衣和马甲往椅背上一靠。他啜饮着咖啡，出神地想着什么事儿。也许他头痛，但从他脸上的迹象看，他更像在回忆一件忘却的往事，而不是在想突如其来的疼痛。他太阳穴上有一根青筋在跳动，在轻轻地、持续地悸动，好像在提醒他回忆一件事情。



一会儿，侍从又走进来，这一次他把艾雅司的烟具拿来了。一盏酒精灯，两只烟枪和一只精工雕刻的玉盒。烟枪在沉默中准备好了。侍从拿了一小团粘糊糊的鸦片，在大拇指和食指间搓揉着，然后把它用针挑着，放在酒精灯的火焰上烤，直到发出爆裂声。艾雅司俯身向前，把烟枪凑近嘴边，侍从就把针探进烟枪里。烟枪发出爆裂声，艾雅司把烟吸进肺里。

侍从用装第一杆烟枪的方式把第二杆烟枪准备好，就离开了。艾雅司把烟抽完就躺回到椅子上。这样过了很久。他的思绪不想跟他交流，免得扰乱他的这种恍惚状态。他感到产生了一个想法，但还没来得及分辨它是什么，它就消失了。他感到，他差点就要跟他自己做一次关键性的忏悔了，但他控制着自己，不采取这种一旦承认有罪，话就再也收不回来的步骤：他此时的感觉有点像杀人犯。

艾雅司有个习惯，他每星期都要进城两三次，去拜访他的画家朋友。他最近结交的一位画家名叫摩根，他是伦敦斯雷得学校的年轻毕业生，也是他的苏格兰老乡。艾雅司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中国人居住区一间没有暖气、没有家具的房间，饥寒交迫地过着野兽般的生活，他在这地方睡的是石头地板上的一张草席子，在破旧包装盒的两边——也就是在他买得起颜料时——画画。由于艾雅司是他的赞助人，他安排那人在老式的美国租界里找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居所，每周付他一小笔津贴并替他出模特儿费用。

这些模特儿一成不变，总是那些稚气未脱的中国少女。